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最终成果

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
历史经验研究

(项目下达编号: 2003DDJ003)

郭根山

2005年3月16日

内容提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历史经验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成功的救国之路。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舍弃了前者而选择后者，主要地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确立。

历史经验之二：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是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捷径。

施行战略性赶超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行国家，实现社会发展的捷径。落后者赶超先行者是一种历史现象。先进的社会制度，最新的科学技术，是中国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基本条件。

历史经验之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注重理论的创新性思考，以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进入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命题，提出并且积极探索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问题。

历史经验的启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借鉴。无论是取得的经验还是产生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政策的生长点。

关键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现代化道路
历史经验 比较研究

目 录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及历史经验

（一）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求富运动的经验教训.....	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正确方向.....	5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7
（四）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局面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	12

二、选择与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选择的历史经验

（一）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后发优势	23
（二）战略性赶超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追赶现代化的捷径	31
（三）中国实行战略性超的必要性	33
（四）中国实行战略性超的可能性	37
（五）对中国实施战略性赶超的几点认识	49

三、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

（一）实现现代化战略的指导思想	51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55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69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72

结束语：珍贵的财富 宝贵的经验

（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79
（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宝贵历史经验	83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及其历史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成功的救国之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舍弃了前者而选择后者，主要地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确立。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任务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的经验教训

1.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任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的独立；对内，打倒封建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方面，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这样，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1]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目标，只有实现了独立，才能谋求富强。

2. 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1840-1949 年几经坎坷，富强的目标到终了还是求之不得；1949-2004 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前后两阶段何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同时也是数代爱国志士不惜流血奋斗，为实现民族振兴，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过程。

为了国家独立与民族富强，中国人几经奋斗，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是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的洋务运动，但所有这些努力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都遭到了失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2 页。

败。甲午战败后，有人认识到，我国落后不仅在器物层面，而更在制度层面，遂有了学习西方制度的呼声。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孙中山达到了旧民主革命的最高峰，他不仅要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要在经济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历史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它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在 1840-1949 年这段时间里，虽有数次“求富”的尝试，但都化为镜花水月，为什么？

民族资本“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他们自己仍然过于软弱和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1]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民族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以致于“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冲力是那么微弱”。[2]

这些分析和结论尽管都非常正确，但却又都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一个失去政治与经济独立的民族，其谋求富强的目标是难以达成的。

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是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的。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本应该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完成，

[1] [美] J. 费正清，刘广京 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1，528 页。

[2] [美] J. 费正清，费维恺 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0 页。

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1]不能坚决地反帝，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就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不能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国家富强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多次的追求国家富强的运动终归失败，原因皆在于没有弄清独立与富强的关系，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注重求富而没有找到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历次求富运动的发动者在处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二者关系时失之偏颇：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无一不是只关注如何富强的问题，而对于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却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因此，以独立求富强则富强可以实现，不求独立而直接求富强则富强未必能达到，找不到谋求民族独立的正确道路，则富强也就不能达到。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的，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3—674 页。

起点”，并认为只有等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并使之获得充分发展。一旦“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正确方向

旧民主革命的失败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上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独立后实现富强的正确道路。

通过对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线索：中国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创设走过一条改良→改革→革命的道路。先是以“中体西用”为旗号的建立在“器物层面”上的改良；后是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建立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运动；再后来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旧体系中一批新兴地主阶级分子意识到民族存亡的危机。他们认为清王朝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无与伦比的，只是缺少坚船与利炮，因而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奇技淫巧”即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正代表了这种改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甲午年中日一战就彻底粉碎了洋务运动的梦想。于是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改革运动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认为，甲午战败不仅在于没有利器，而且更在于缺乏先进的社会制度，因而他们不仅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要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081页。

求仿效帝俄和日本的改革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随着这种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的运动被清廷镇压，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式的革命方式便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应运而生了。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成为中国确立现代化前提条件的最高形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改良主义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中国社会发展究竟应当走革命的道路抑或是改良的道路？就这一问题，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论。只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由于反动政权的镇压，也由于改良主义者逐步感受到人民革命所代表的正确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才经过认真的反思从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改良到改革到革命的这种步步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这种历史发展的轨迹同时也表明，革命是中国造就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必然选择。

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并不是起因于革命者的“过激行为”，而是起因于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和残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

运用革命的手段造就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

的逻辑结果。“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1]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实达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目标，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其直接结果便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2]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取得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一个民族若要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首要条件就是享有独立的政治地位，遭受外族统治的民族必须首先取得民族独立。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诚然，马克思在讨论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统治的问题时曾经提出过“双重使命”的论断：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破坏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这里确实论述过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给印度等前现代社会带来的生产力的某些方面的发展，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殖民主义者“被迫”地、“不自觉”地创造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怎样才能为“野蛮的”落后国家造福的问题：摆脱外族统治、取得民族政治与经济的独立。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殖民主义的入侵充其量只不过起到了一种外部的“刺激”作用，一个前现代国家能否成功地迈向现代社会，关键取决

[1] [美] M. 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3页。

于这个国家内部能否成长起来现代化的推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大业，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造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使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权保障。对于一个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华民族来说，民族独立是百年奋斗史上至高无上的价值。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国度里，中央政权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意有效地领导、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投入现代化运动，那么，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为革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近代中国社会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够担当起领导和推动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从现代化后进国家急需政府主动积极地寻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中国政府那种自甘在经济管理和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的态度，确实令人吃惊。”^{〔1〕}因而，推翻不能致力于或不愿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权，改组散乱的社会秩序，代之以全力推动现代化的政权和整合的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复兴的政治基础，“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的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2〕}

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经过长达两千年的繁衍已经成为抵抗现代性的顽强力量，不打破旧的政治制度就无法形成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不铲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新文化，就不能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群众基础。这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一项内容。

〔1〕〔美〕G.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页。

〔2〕〔美〕G.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页。

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二项内容在于消灭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意识固然很需要，但消灭封建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则是反封建的最根本的任务。不推翻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无法为新的生产力开辟广阔的道路。

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不久就投入了反对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斗争，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由于共产党的实力尚处在比较弱小的阶段，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因而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前的土地革命运动都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这时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发挥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这个阶段的土地革命运动的直接目的在于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形成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以便积蓄力量最终彻底扫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经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农民无偿地得到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彻底消灭的封建剥削制度，摧毁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造就了独立、统一、团结、稳定的内外部政治环境

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似乎是一个无需证明的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公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论证过这一问题。“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还特别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2]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特权被取消，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造成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因素——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从根本上被铲除，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中国人民由此可以安居乐业；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被消灭，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这种政治条件为中国人民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中国革命在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美国学者这样评论说，中国革命“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纪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即使没有提供政治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大多数革命之后都出现长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期的政治动荡、混乱、暴力，甚至是爆发内战；而 1949 年后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引起政治混乱，反而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孙中山曾经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1]

运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政权，进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造就生产力发展的新基础，是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统一全中国，剥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财产，虽然这还不是生产的直接发展，还不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不是现代化的实现，但是，它却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2]

（四）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局面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

当新中国开始全面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资本

[1] [美] M. 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3 页。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的局面，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更有利于充分利用本国各方面资源的社会制度，以便尽快使中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从理论上讲，这时我们仍然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历史与现实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1. 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标准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当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现代化运动的时候，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标准只能是：哪一条道路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快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哪一条道路能够让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仅更加有可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还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固有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因为它能够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因为，虽然“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2]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

首先，新的社会制度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相对于资本

[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主义制度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加绚丽的前景。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提供制度的保障。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能力。由于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当然，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具备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是说选择了先进的制度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也不是说选择了先进的制度以后中国自然而然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实现现代化了。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一些波折甚至是重大失误。应当说，制度和制度的运作、政策与政策的执行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因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1]“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2.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依据：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选择，因为它是其他各种发展道路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之后的一种选择。

首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掠夺，它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

[1]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9页。

[2]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